

全球对话

GLOBAL DIALOGUE

4.2

4 issues a year in 14 languages

社会学作为志业

Dorothy Smith,
Herbert Gans

社会学和政治之间

An Interview with
Nicolás Lynch

乌克兰动荡

Volodymir Paniotto,
Volodymir Ishchenko

气候变迁

Yuan Tseh Lee and
Andrew Wei-Chih Yang,
Herbert Docena

中国真正的革命

Feizhou Zhou,
Yonghong Zhang,
Ying Xing

- > 权力的殖民性
- > Chiapas: 面对不平等
- > 叙利亚监狱
- > 伊朗女性的命运
- > Jan Szczepański: 搭起桥梁
- > 波兰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义
- > 波兰学生的公开信
- > 土耳其团队

NEWSLETTER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第4卷 / 第1期 / 2014/03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

GD

> 主编的话

面对不平等

这是即将在 7 月 举行的横滨世界大会之前最新一期的全球对话，而预期大会人数将会有 5500 人。大会主题：面对不平等的世界，是本世纪最重要的议题。即使经济学家也都涌进这个社会曾经主导的领域了，最好的例子就是 Thomas Piketty 的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这期全球对话也处理了这个议题。李远哲和杨为植告诉了我们不同领域其使对于全球暖化有相同的关信，这点也被 Herbert Docena 所强调。他报告了联合过气候变迁会议的结论，而美国又是如何把自己的方式强迫推销给其他国家。其他国家虽然不同意，但是力量分散且不够强大。我们在殖民性的概念中看到这个现象。César Germana 认为这是全世界重多不平等的根源。我们的确在 Volodymyr Ishchenko 和 Volodymyr Paniotto 的乌克兰文章中看到了冷战的复苏让乌克兰反统治阶级的运动陷入了分裂的危机。

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并没有比国内的不平等来的严重恶化，特别是在半边陲的国家，像是印度和中国。为什么？中国社会学家周飞舟、应星、张永宏叙述了上海、北京之外的城市的景象，是如何从农村转变成为都市，如何剥削了农民和工人，以及如何炒作土地，让新兴的精英阶级得利。我们看到了农民并没有买单，但是也很难有成功的抵抗。

「面包、自由、正义」的口号遍布在 3 年前埃及推翻了 Mubarak 独裁政权时后，而在民主实验之后，他们又再一次面对了军事统治的政权。阿拉伯之春的理想在其他地方也黯淡了，像是叙利亚的内战，难民大量涌入旦、黎巴嫩、土耳其。Abdulhay Sayed 告诉了我们鲜为人知的监狱刑求内幕。另外还有伊朗社会学家 Shirin Ahmad-Nia 所描述的伊朗在 1979 年革命后的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变。

同时，东欧仍然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现在已经渗透到高等教育了，公共社会学实验室讨论了这个现象和可能后果。他们也描述了 ISA 前会长 Jan Szczepański (1966-1970) 的理念：「人性的社会主义」。



Dorothy Smith, 女性主义者，叙述她怎么认识女性主义以及如何发展出特殊的方法：制度民族志。



Herbert Gans
美国社会学家，叙说他对未来公共社会学的愿景。



Nicolás Lynch
秘鲁社会学家和政治人物，叙述他一生在左派政治和学术之间徘徊的故事。

全球对话以 15 种语言刊出，请至 [ISA website](http://isa-berkeley.org)。

投稿请寄给 burawoy@berkeley.edu

> 编辑团队

主编:

Michael Burawoy.

执行主编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副主编:

Margaret Abraham, Tina Uys, Raquel Sosa,
Jennifer Platt, Robert Van Krieken.

編輯顧問:

Izabela Barlinska, Louis Chauvel, Dilek Cindoğlu,
Tom Dwyer, Jan Fritz, Sari Hanafi, Jaime Jiménez,
Habibul Khondker, Simon Mapadimeng, Ishwar Modi,
Nikita Pokrovsky, Emma Porio, 佐藤嘉倫 Vineeta Sinha,
Benjamín Tejerina, 伊慶春
Elena Zdravomyslova.

区域编辑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Juliana Tonche,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Rafael de Souza.

哥伦比亚: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Katherine Gaitán Santamaría.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Ritu Saraswat, Nidhi Bansal, Uday Singh.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ajmeh Taheri, Hamidreza Rafatnejad,
Faezeh Esmaeili, Saghar Bozorgi, Faezeh Khajezadeh.

日本:

Kazuhisa Nishihara, Mari Shiba, Kousuke Himeno, Tomo-
hiro Takami, Yutaka Iwadate, Kazuhiro Ikeda,
Yu Fukuda, Michiko Sambe, Yuko Hotta,
Yusuke Kosaka, Shuhei Naka, Kiwako Kase,
Misa Omori, Kazuhiro Kezuka.

波兰:

Krzysztof Gubański, Emilia Hudzińska, Kinga Jakiela,
Kamil Lipiń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Mikołaj Mierzejewski, Adam Müller,
Przemysław Marcowski, Patrycja Pendrakowska,
Zofia Penza, Konrad Siemaszko.

罗马尼亚:

Cosima Rughiniş, Ileana-Cinziana Surdu,
Adriana Bondor, Ramona Cantaragiu, Ioana Cărtărescu,
Miriam Cihodariu, Daniela Gaba, Mihai Bogdan Marian,
Mădălin Răpan, Alina Stan, Elena Tudor.

俄国: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Elena Nikiforova, Asja Voronkova.

台湾:

何经懋

土耳其

Yonca Odabaş, Günnur Ertong, İlker Uurlu
and Zeynep Tekin.

媒体顾问: Gustavo Taniguti, José Reguera.

编辑顾问: Abigail Andrews.

> 本期内容

主編的話：面對不平等世界	2
社会学作为志业：制度民族志的系谱 by Dorothy E. Smith, 加拿大	4
社会学作为志业：期待未来 by Herbert Gans, 美国	6

> 拉丁美洲

社會學和政治之間 An Interview with Nicolás Lynch, 秘魯	8
權力的殖民性 by César Germana, 秘魯	11
Chiapas: 面对不平等 by Markus S. Schulz, 美国	14

> 中东

敘利亞監獄 by Abdulhay Sayed, 敘利亞	17
伊朗女權的進步？ by Shirin Ahmad-Nia, 伊朗	19

> 烏克蘭反叛

Euromaidan反叛運動 by Volodymyr Paniotto, 烏克蘭	21
革命尚未開始 by Volodymyr Ishchenko, 烏克蘭	24

> 氣候變遷

改变人类发展 by 李远哲、杨为植, 台湾	26
市场主宰人类的命运 by Herbert Docena, 菲律宾	28

> 中国的变与不变

中國都市化的變遷 by 周飛舟, 中國	32
土地掠夺和贪腐 by 张永宏, 中国	34
疏濬抗議 by 應星, 中國	36

> 波兰

Jan Szczepański – 建造危险的桥 by Adam Müller, Kamil Lipiński, Mikołaj Mierzejewski, Krzysztof Gubański and Karolina Mikołajewska, 波兰	38
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義 by Dariusz Jemielniak and Karolina Mikołajewska, 波蘭	40
高等教育改革公開信 from the Public Sociology Lab, University of Warsaw and the Critical Section,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of Cracow, 波蘭	42

土耳其团队	44
-------	----

> 制度民族志的系谱

by Dorothy E. Smith, University of Victoria, 加拿大



Dorothy Smith.

Dorothy Smith 是女性主義社會學者的先驅，其「制度民族誌」把日常生活放到更廣的賣絡中，特別是「統治的關係」。她是許多「給女性的社會學」著作的作者：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A Feminist Sociology (1987), The Conceptual Practices of Power: A Feminist Sociology of Knowledge (1990), 和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 Sociology for People (2005)。她也得過很多榮譽，像是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和 Canadia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Association。現在是 ISA 的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TG06) 成員。

我想寫作關於社會學作為志業，對我來說並不容易。特別是要說說關於我什麼時候開始感興趣，讓我獻身努力於這個領域的。我是意外地成為社會學家的，這是一連串的依賴過程：第一，我個人歷史的意外，第二，兩個我所投入運動的意外，這轉變了我。

意外：我 1952 到了 LSE，因为我对行政工作一点兴趣也没有，想说若有一个大学学位，那我应该会找到比较有趣的工作吧。于是我在那得到了社会科学的学士，然后遇到了我的先生 Bill Smith，结了婚，后来到了 Berkeley 念社会学博士。我之前就主修社会人类学。

Berkeley 是一个非常新的经验。在 LSE 没有什么社会学。而我们念涂尔干、马克思、韦伯等其他人的学人口学，关于种族的基因理论，社会哲学、伦理等等。我们讨论且激辩。我受到很大的震撼和启发，Berkeley 的社会学让我学到很多，特别是在那个 McCarthy 时代。

回顧來說我可以看到在我唸研究所的時候，也就是 1955-1963，社会学是一个专业的领域，而且和之前的复杂政治脉落变得不相关。这样一来和芝加哥学派的传统连结变弱了，Berkeley 的社会学和其他地方的社会学也都继续去政治化，只在 C. Wright Mills 的作品中

>>

找得到政治批判的影子。那时 Parsons 的社会行动的结构非常有影响力，马克思乏人问津。社会学在那个年代的重新建立包括了概念的重新塑造：例如，社会阶层化的概念比阶级要来的普遍，而因为商业的重要性，组织的理性这种空洞的概念也被发展出来，很显然也是特别为了让管理学接收而来的。

意外：Bill 是我先生，他在 1963 年某天早晨离开了我们。我们有两个小孩，一个只有 9 个月大。我开始要承担责任赚钱，而且我必须发表，我喜欢做研究和写作，可是没想过发表。于是我开始让我自己专业化。

在 1981 时我找到了工作是在加拿大的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我的大儿子 8 岁，和我一起要在多个选择之中做出了这个决定（那时大学扩张中），因为当我们看着 Vancouver 的地图的时候发现该大学在很北边，而且没什么道路。

意外：2 年后后我深受加拿大本土化运动所影响，这个运动一开始是在文学和历史领域，而后来社会学也开始赶上了。那时候我发现我在 Berkeley 的训练好像是在罗马帝国一样，要把罗马的秩序带到世界上其他地方，我教的社会学和我所处的社会一点关系也没有。

现在我刚成为加拿大的公民，在我的教学中我試著去了解加拿大社会。我记得我在 LSE 的时候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对于社会科学的献身，以及著作和其身处的时代脉落，而现在重读一次，发现这个社会和他们所描述的帝国主义时代很不一样，其概念、方法、主题等等也大相径庭。

但是后来有了女权运动，也有了一个机会让我再过去 20-30 年之间可以投

入，变成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另一个自己。我从 Berkeley 学到的社会学很不一样。发展一个女性为主体的社会学是我想做的事情。虽然这个目标尚未实现，仍要继续做下去，也要和我的教学不断对话，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发现会带来什么改变，但是我的知道我们可以努力去做。

现在所谓的制度民族志是从那些我们研究、谈话、写作等活动的持续实践中开展出来的。这可以算是社会学吗？若你指的是主流我们在研究所上的理论课和方法课的那样，那答案是不。这是方法论吗？不。或许这可以被视为另一种社会学，这种社会学致力于发掘人们真实的经验，实做、关系等超越个体层次的问题。这是我的研究领域，和其他制度民族志学者对话。发现不是志业，是持续不断的投入和惊艳。

而且，然而，社会学提供了论述和制度的空间让制度民族志可以有其场域（在其他不相关的场域也是，如照护）。今天的社会学已经没有那种程度的一致性了，这也是我在 Berkeley 所接受的训练。那些去进一步了解社会的关怀已经在不同的方向展开了，这里我觉得研究和思考，特别是分享了制度民族志的目标的知识实践，是可以进一步转译人们的问题和烦恼成为公共议题的。这也正是 C. Wright Mills 给我们的启示。■

> 放眼未来

by Herbert J. Gans, Columbia University, 美国



Herbert Gans.

Herbert Gans 是过去50年来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美国社会学家。他是都市贫穷领域、社会阶层、族群、种族、媒体、大众文化、反贫穷计划等领域的领导人物。他写过许多书，像是经典的 *The Urban Villagers* (1962), *The Levittowners* (1967), *Popular Culture and High Culture* (1974), *Deciding What's News* (1979), *The War Against the Poor: The Underclass and Antipoverty Policy* (1995) 和最近的 *Imagining America in 2033* (2008)。其作为一位公共社会学家，也常在报章杂志上著述，也参与制定社会政策。他也获得许多奖项，也担任过美国社会学会会长。

美国就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正在历经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其结果就是造成政治和阶级的不平等。社会学家应该自问我们这个学科可以扮演什么角色，特别会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变迁。

可是，这个学科需要和这个国家更相关才可以，所以才能够让其更被看见和重视。虽然现在的社会不平等是全球性的，其国家政经之间的差异，以及各国社会学家所提出的建

议，让我们觉得每个国家要有自己的解决办法。这只要想想全球性的结果就知道。而接下来的就是美国社会学家试图要有一个更细致的图像提出来，以及改怎么办。

有许多论著已经聚焦在这个不平等议题上，可是社会学要能够更关注其造成的制度性影响。微观的角度，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的不平等都需要更多的解释。只要有可能的话，社会学研究应该要更

政策导向。这不可能去期待说真正去制定政策，这是本分之外的事情，而是说，我们的研究可以让政策去参考，让那些制定政策的人可以更了解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仍然多注重在精英的现象，社会学家必须注重非精英的行动。未来的研究必须放在那些弱势族群上面，特别是那些在平均所得以下的人民，因为他们是这个日益严重不平等现

象的最大受害者。他们没有什么代言人替他们发声，也被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所以应该受到更多注意。

社会学不可能代替这群人发声，可是可以更关注他们的问题。研究应该特别着重在社会、情感、以及其他的不平等层面。例如，过去几十年来，特别是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了社会显著的向下流动、向上流动的停滞、期待的降低。社会学家应该在更早之前就该把这种现象当作主要的研究领域才对。

此外，社会学家应该要更注意贫穷长期的影响，像是可能会造成的常后创伤症候群，这会影响好几世代。同时，研究者也应该了解人们怎样处理、对抗这样的社会向下流动，若我们设计好一点的话，类似研究可以提供许多有用的帮助。

更重要的是，社会学家对于那些在平均所得以下的人们的关注必须延伸到制度和行动者的层面，这是关键的层面，因为影响很大。研究这些造成部平等的原因是重要的，不但对研究者重要，对于那些

人的学习更是重要。

还有，社会学家应该要宣扬社会学的用处。最好是提供研究发现，点子等和当今热门话题、议题、争议有所相关。虽然说得比较容易，社会学家还是要少一点去做重视所谓的文献，还要其他学科的贡献。少一点重复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的研究，也是有帮助的。

社会学家必须继续研究其他社会科学所忽视的问题，或他们看不到的问题。社会学家也应该更去发掘那些隐藏、不被看见的议题。

有可能的话，社会学应该重视经验研究，量化和质化都是。尽管现在有所谓的大量资料的容易取得性，这个学科应该继续去收集和分析小量的资料，特别是透过民族志田野调查。透过和人们相处去了解这个社会是社会学的最重要贡献。

这个学科应该更有创新的理论，概念也要质疑过去的传统，像是标签理论，关系论、建构论等。现在的不平等现象或许可以提供我们更多的机会去用更新的角度看待美国社

会。

总之，社会学应该努力去和公众连结，透过呈现社会学的观点和发现，以清楚、非学术语言的方式让公众感到兴趣。大学生的教育和高中教育仍然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公共社会学。研究者必须不但要知道怎么写作，还要受到公共社会学的训练。同时，社会学家要生产公共知识，得到的回馈和那些专业社会学家必须要一样。

这只是我个人对未来的蓝图而已，可是我充满希望。其他人当然也可以提出。总之这个学科必须对未来有更多的想象，才可以让明天会更好。■

> 社会学和政治

訪談 Nicolás Lynch



Nicolás Lynch.

社会学和政治 訪談 Nicolás Lynch

Nicolás Lynch 是秘魯位於 Lima 的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an Marcos 社會系教授。他是秘魯社會學會的會長 (1998-2000)，也是教育部长 (2001-2002)，总统顾问 (2002)，和驻阿根廷大使 (2011-2012)。他在美国的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拿到社會學士，在墨西哥 Latin American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拿到社會科學碩士，也在許多美國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其出版的著作包括了 *Los jóvenes rojos de San Marcos* [The Red Youth of San Marcos], *La transición conservadora* [The Conservative Transition], *Una tragedia sin héroes* [A Tragedy without Heroes], *El pensamiento arcaico en la educación peruana* [Archaic Thinking in Peruvian Education], *Los últimos de la clase* [The Worst of Education], *¿Qué es ser de izquierda?*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Leftist?] 和 *El argumento democrático sobre América Latina* [The democratic argument about Latin America]。他也是報紙的專欄作者：Lima newspaper *La República*。同時，也是政治評論的主編：Otra Mirada [Another View]。

布：作為社會學家，你的生涯很不一樣，進出政治領域。或許我們從最簡單的問題開始好了：你是政治家或是社會學家？

NL：我是社會學家，會學家並不學家只是學家因為我受過訓練，還因為我真的喜愛社會學。而我也喜歡政治，我的國家是政治與人緊密相關的，我從年輕時就從事政治活動了。

布：有趣，韋伯一直想從政，把社會學和政治清楚劃分，可是你似乎相反。我的理解對嗎？

NL：對我來說社會學是科學，是社會科學，但我們同時也是社會行動者，也是我們所研究的社會的一部分，社會學家 Alain Touraine 在拉丁美洲很有影響力，就強調這種行動者的社會學，我想他是對的。從一開始我的社會學研究就和我的政治生命有關，我的許多著作就是關於這個。

布：讓我們談談你的最後一個職位：出使阿根廷。原因是為什麼呢？

NL：我在 2009 年成为 Humala 总统竞选团队的成员，是由几位朋友邀请加入的，而其实 2006 年我就是了，那时他第二高票。我一开始对于有人宣称自己是左派民族主义者是抗拒的，而且是个退役将领，曾经打过 dirty war，就是 Sendero Luminoso [Shining Path]。但社會黨在 2006 年的选战惨败让我和几位友人加入了 Humala。现在想想我们的动机是对的，可是某种程度上也被骗了，因为 Humala 和妻子要的只是权势。

布：為了感謝你在選舉時的之值，總統 Humala 讓你出使阿根廷。他要你在 Buenos Aires 做些什麼？

>>

NL：他讓我出使阿根廷去完成一些政治任務。秘魯和阿根廷的關係並不好，是因為在 Humala 之前的政府不喜歡阿根廷的進步政治立場。總統給我的任務是改善兩國關係，這對於拉丁美洲整合很重要，以及 Union of South American Nations 也是。Humala 告訴我秘魯在這塊地圖上必須有個位置，那我就是去達成這個任務。

布：這個工作的挑戰和成就？

NL：第一，在 Buenos Aires 的文化和知識生活可能是拉丁美洲最好的。而且阿根廷歷經了重要的社會和政治變遷，這很有趣。阿根廷在財富重分配上做得很好，人權和政治獨立上也是如此。和其他的拉丁美洲國家相比，阿根廷有最高的就業率，勞工權益也是。而在 1970 年的蕭條，他們把 200 個軍事人員關起來，這也是很特別的。因為如此，阿根廷也有很强的公民身份傳統。

布：但結果來得很突然，對吧。你丟掉了工作？

NL：Humala 政府後來右轉了。當然這個轉變不是一夕之間的事情，是有長期因素的。首先，他解散了進步的內閣，然後也和左派議員劃清界線。從秘魯右派和美國那邊得來的壓力讓他放氣了原本的改革目標，然後追求新自由主義。而又轉之後，總統的新盟友想要把我弄掉，所以設了一個陷阱。或許我的錯誤就是沒有一開始就辭職，但是那時候要做出對的判斷很難。

布：陷阱是什麼？

NL：在 2012 年的 1 月下旬，當我还是駐阿根廷大使時，我收到了一封從秘魯寄來的信，關於 Movadef 的立法。這是一個恐怖組織的前線團體寄來的，叫做 Shining Path，想要替他們入獄的領導人物特赦。後來 10 個月後，11 月上旬，一個右派秘魯報紙說我是 Movadef 的同情者，必須下台。政府沒有幫我辯護有沒有展開調查。而我和那個組織一點干系也沒有。而 1982 年我還收過他們的死亡威脅信，並暗殺了很多我的朋友，他們是恐怖組織，從來不檢討自己。不論如何右派有實力讓我走人就是。

布：我看到了秘魯政治人物可能的樣子了。但這不是你第一次擔任政府職位。你在 Toledo 政府當教育部長，這是一個企圖恢復民主的政府。請你多說一些。

NL：這是我反對 Fujimori 獨裁的結果。我已經是 Foro Democrático 的成員，這是一個公民組織。Toledo 是一個自由中間派，代表了新的秘魯民主，並組成了大聯合政府。我的目的是展開教育改革，讓其可以改善我們

的教育體系，因為那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沒有什麼預算，水準也低。所以我必須面對兩個敵人，世界銀行和毛主義的教師工會。第一個總是要私有化一切事情，第二個是不習一切代價只想保住工作，不接受評鑑。我後來成功推動了教改，但是 Toledo 沒能抵擋得住壓力，于是我下台了。

布：我認為這種政治是危險的事業，特別是你從來沒有放棄你的左派思想！所以在這個脈落下社會學是否讓你回來？提供你慰藉？幫助你的政治事業？社會學對你來說是另一種政治嗎？

NL：不只是慰藉。社會學幫助我了解秘魯社會和其世界上的位置與角色。關於教育的話，社會學幫我理解秘魯教育問題是意識型態和政治的問題，而非技術這種國際會相信的緣故。社會學給我工具，讓我知道教育不只是成績，而和集體的自我了解和認同有關。

我從來沒有離開學院過。34 年來我在 San Marcos 教社會學已經很久了，這也是最古老且最有名的秘魯大學。我參加過了至少 9 個大型計劃，出了幾本書，有些很重要，有些比較是政治的，有些是偏社會學的。

布：這些書很少被翻譯成英文，可以請你跟我們大概簡介一下，特別是和政治的關聯？

NL：沒有英文的原因和我和英文學術界的複雜關係有關。例如我對民粹的研究，我研究 90 年代晚期拉美的民粹主義，想要解釋民粹的新自由主義並不存在，因為這是矛盾的两个概念。我指出歷史上的民粹對於地區和民主都是好的。而我以西班牙文發表之後，我送到了美國重要的比較期刊上，一個月後我收到了很長的回復是我並不知道什麼是民粹。好，我們只是想法不同。可是那個期刊卻刊登了一篇批評我這篇西班牙文的文章，所以我的文章要發表，還不夠好，可是要被批評，却是很適合的！我很多次都收到相同的觀點：如果你不同意，那你就該知道你在說什麼。

我最新的書是關於拉丁美洲不同的民主理論和實踐。我想要解釋那些新的政府——Hugo Chávez, Lula, Correa, Evo Morales 和 Kirchners——怎麼去發展不同模式的民主，重視重分配，社會正義、參與。這本書的目標是呈現不同民主的面貌，並分析相關的轉型和鞏固民主的論述。

布：現在有任何方式可以把社會學帶入政治爭議之中嗎？

NL：有。例如在最近幾個月我們討論了中產階級。而新自由主義者和民調業者宣稱秘魯有 70% 是中產階級，但却是用很奇怪的標準。

所以我们几个人曾经写过社会阶级、结构、斗争的人，几年后的现在又出来指出那些政治评论者的谬误所在，让大家知道社会学有更精准和复杂的视野与角度。

布：你在美國拿到博士並時常到美國，我想那就是我們可以在 Wisconsin 遇到的原因。那我想知道秘魯的左派在美國都從事些什麼活動？

NL：我從墨西哥拿到碩士，我也在拉美和歐洲有許多學術活動，在美國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樣，有很多學習的機會。我在 80 年代从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拿到博士，那是一个很好很进步的大学。我在其他地方已经是访问学者了，像是 Wisconsin Madison。我想我应该在美洲之间开启对话，没有共识没关系，重点是理解对方。

布：我想知道在你的生命史中，是什麼樣的背影，比方說家庭或是教育，促使了你日後同時選擇了這兩者？

NL：嗯，我想對很多人來說，我並不是很適合從政，我是中上階級的小孩，沒有原住民的身份，而且受到好的教育。或許是因為秘魯的長期不平等讓我想要從政和同時做社會學吧。但我一直很快樂從事兩者，兩者相互影響，我不後悔。

布：既然你已經不政府職位了，那你最近致力於什麼事情？仍然是政治事務嗎？或是寫作？

NL：是的，我仍然熱衷政治。我是一個左派聯盟的成員，這個聯盟在秘魯各地都有影響力，我們也對下一屆的地方選舉（2014）很有信心。我也有一个网站是和这些朋友一起架设的，是一个政治分析的平台。我们把政治分析每天寄给 15000 个电子邮件地址，另外也有广播平到，还有分析公共政策。像我说的我也继续在 San Marcos 大学授课，快要完成一本书，是关于秘魯未來的長篇政治評論。

布：我想韋伯會很羨慕你！你可以在政治和社會學之間游刃有餘，不會犧牲任何一方！謝謝！ ■

> 权力的殖民性

秘鲁观点

by César Germana, Universidad Nacional Mayor de San Marcos, Lima, 秘鲁



Aníbal Quijano

这个结构方法。从1970年代，我们已经看到了转社会科学转型的复杂性，且已经重组了。Gulbenkian Commission 报告或许是社会思想里面，特别是20世纪晚期最重要的一个对此议题的检视。这个报告告诉了我们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结构已经开始动摇，在中心或边缘国家都是如此，而且这些思想浮现出来，企图发展一个新的认识论。

我这为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结构所维持的是一个现代权力的殖民系统。这和特别看待与组织自然与社会世界的方式有关。有三个中心思想：

首先是简化。对Descartes来说，了解复杂的过程是必要的，要把他门分成好几个部份，好让我们可以分别进行研究，所以清楚就是代表简化。这个观点导致了知识的专门化和分工，产生很多学术领域，然后发展出不同的方法与领域。学科也发展出制度的分类，好让每个不同的学科可以存在于现代大学的组织系统内。

第二个是社会与自然系统的稳定性。这个概念把实在看作是有秩序的系统，并遵循着简单和可知的法则运作着。这个默认了知识可以让我们做出预

有许多证据显示我们正在历经现代的殖民已经面临了结构性的危机，这个殖民非常强大，已经持续500年。而危机是整个权力结构所必然面对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这个危机已经在各

个层面发生了，像是性别、劳动、政治、互动、自然等等，这些问题已经不是现代系统可以解决的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社会系统。

特别重要的是互动结构的危机，以及社会科学所用来认识

>>

测，然后控制，不仅是自然，还包括社会。这个信念产生了决定论和可回溯论，也就是事件可以重复，历史因此不再有偶然。

第三是客体性。这个是说实在是可以知道的，而且主体可以放入括号之中。结果就是认为知识是价值中立的。

在殖民的现代权力模式里面，欧洲中心主义强加了上去，把这种知识系统看成是唯一正当的系统，所以边缘化和排挤、甚至消灭那些被殖民的知识系统。这些知识暴力的排挤和边缘化那些边缘的知识，所以其目的是要去消灭那些知识形式，把他们看作是劣等的。

这个殖民现代的权力模式中，边缘开始质疑欧洲中心的知识模式。主要的贡献包括的后殖民研究、从属者研究，以及许多非洲知识分子的著作。在这个思潮里，一个分析性的「殖民—去殖民权力」提供了最有用的方式去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知识系统，而且也提供了去了解现代社会和未来的方式。由 Anibal Quijano 在 Lima 于 2010 年 8 月所主持的 The Questions of Dis/Coloniality and Global Crisis 研讨会就是这一系列辩论的高潮，也是起跑点。

殖民—去殖民权力的分析提供了知识论的观点，可以用来了解实在，也提出问题和响应给相关的议题，特别围绕在人类的社会生活。这开启了许多欧洲中心主义知识论所看不到或消除的对话。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生产方式因此受到这个架构的挑战，进一步来说，这个分析架构质疑了现代殖民资本主义知识生产体系的最根本预设，而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去检视这些知识论和理论的默认，提出可能性，挑战霸权。我试着去梳理这些疑问，然后检视社会理论的重组可能。

若按照 Anibal Quijano 的

理论，我认为在 1492 的欧洲征服美洲导致了这种权力模式，默认了现代性和殖民性。另外，这也是透过定义殖民性，而权力关系在这段期间备件立起来，并且和「种族」的概念纠结在一起，是社会分类的一个基本核心方式。话剧话说，征服者想象他们是高等的人类，并认为自己是白人，而被征服的是次等得人类，是印地安人或是黑人。为了要自然化这个社会关系，种族正当化了对原住民和非洲人的宰制和剥削，这在殖民独立战争之后仍然如此。这保证了自然的宰制和被宰制社会关系。同时，现代性作为殖民性的另一面，理性化社会生活，科学和科技进步是唯一的发展指标。(1)

认识论的去殖民化要去质疑欧洲中心主义知识的默认，然后提出另外的诠释，这或许可以发展出了一个更好的知识论，也可以更平等和民主。我提出五个质疑，这些针对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也是五种另外的诠释架构，以我的权力殖民和去殖民为基础。

1. 质疑国家作为一个了解社会生活的分析架构。国家结构不可以被认为是社会关系的边界，所以这个全球的分析单位要强调现代殖民模式如何在 16 世界产生，然后欧洲怎么征服了美洲。

2. 质疑殖民权力的概念，然后了解剥削和宰制的关系，这是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不仅是要检视经济、法律、政治、的剥削和宰制，还要去看在现代殖民系统内这些权力关系是怎么相互连结在一起成为象征和正当的观念，并且以「种族」的概念被再现出来。所以，建构起全球资本主义的欧中权力剥削模式是相当种族主义的。

3. 质疑简化的认识论，特别是那种为了要了解社会复杂性而去把知识对象分割

为许多独立的片段。所以权力殖民的分析强调了解全球、现代殖民的权力模式是一个历史的整体。这是说，其了解权力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系统，相互纠结，并在 16 世纪出现，然后现在正在历经结构性的危机。从这个观点而言，绝对武断的学科学区分，像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是没有用的。然而，我们应该把这个视为是历史过程的偶然。此外，社会知识的专门化从欧洲 19 世界的社会科学历史建构而来，是没有任何认识论正当性的。并且只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和问题适用。

4. 质疑主体和客体的二分。这里所要挑战的是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因为这两者观点都预设了实在的全知性。特别指社会实在。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去承认世界存在在主体以外，但是这个主体介入了社会知识的生产，所以改变了其所测量的对象。因此，知识是一个互为主体的产物，并且以互动的结构和知识论法则、社会法则所见立起真理，以及被理解。

5. 质疑科学的人文知识的二分。若科学知识可以被从经验研究的过程分离出来，特别关注真理的追求，以及人文学科讨论伦理和美学，则知识的殖民分析要强调的是知识在每一个生产的环节都是真的、善的、美的。这很重要，我们因此期待这个被现代性理性化和除魅的世界可以再一次魅化。

总结来说，我们所提出的知识论观点可以被普遍化，也可以延伸到很经验的理论层次，普遍理论是关于权力的全球模式，危机，以及历史的新的可能选择。而经验的理论是关于

>>>

权力历史模式的最特别的领域。■

注1: Aníbal Quijano 介绍了权力殖民的概念 (1991), 其后来的著作包括了 Quijano and Wallerstein (1992) and Quijano (1993, 2000a, 2000b, 2000c, 2001, 2003, 2004, 2007, 2009 and 2010). For a debate about this concept, see the following texts: Mignolo (2003), Escobar (2003) and Pachón Soto (2007)。

References

Escobar, A. (2003) "Mundos y conocimientos de otro modo: El programa de investigación de modernidad/colonialidad latinoamericano." *Tabula Rasa* 1: 51-86.

Mignolo, W. (2003) *Historias locales/diseños globales: Colonialidad, conocimientos subalternos y pensamiento fronterizo*. Madrid: Akal.

Pachón Soto, D. (2007) "Nueva perspectiva filosófica en América Latina: el grupo Modernidad/Colonialidad." *Peripecias* 63.

Quijano, A. and Wallerstein I. (1992). "Americanity as a Concept or the Americas 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134, UNESCO: 617-627.

Quijano, A. (1991) "Colonialidad y modernidad/racionalidad." *Revista del Instituto Indigenista Peruano* 13.29: 11-20.

_____. (1993) "Raza, etnia y nación en Mariátegui: cuestiones abiertas." In: Aníbal Quijano et al. (eds.) 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y Europa: El otro aspecto del descubrimiento. Lima: Amauta: 167-188.

_____. (2000a) "Colonialidad del poder, eurocentrismo y América Latina." In: Edgardo Lander (ed.), *Colonialidad del saber: eurocentrismo y ciencias sociales. Perspectivas latinoamericanas*. Buenos Aires: CLACSO/UNESCO: 201-246.

_____. (2000b) "Colonialidad del poder, globalización y democracia." In: *Tendencias básicas de nuestra época*. Caracas: Instituto de Altos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Pedro Gual: 21-65.

_____. (2000c) "Coloniality of power and social classification." In: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6.2: 342-386.

_____. (2001) "Colonialidad, poder, cultura y conocimiento en América Latina." In: Walter Mignolo (ed.), *Capitalismo y geopolítica del conocimiento. El eurocentrismo y la filosofía de la liberación en el debate intelectual contemporáneo*. Buenos Aires: Signo: 117-131.

_____. (2004) "O 'movimento indígena' e as questões pendentes na América Latina." In: *Política externa* 12.4: 77-97.

_____. (2007) "Don Quijote y los molinos de viento en América Latina." In: *Investigaciones Sociales* 10.16: 347-368.

_____. (2009) "Des/colonialidad del poder: El horizonte alternativo." In: *Pasado y Presente* 21.

_____. (2010) "' Bien vivir' para redistribuir el poder: Los pueblos indígenas y su propuesta alternativa en tiempos de dominación global."

In: Oxfam Annual Report 2009-2010: Pobreza, desigualdad y desarrollo en el Perú.

Wallerstein, I. (1997) *Abrir las ciencias sociales*. México: Siglo XXI.

> Chiapas:

面对不平等

by Markus S. Schulz,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美国, member of the Program Committee of the 2014 ISA World Congress, ISA研究委员会(RC07)会长



Maya原主民争取女性权利。Markus Schultz摄影。

2014年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NAFTA) 的20周年。这个协议是加拿大、墨西哥、美国的自由贸易条约，也是第一个不同发展程度国家之间的条约，作为了日后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和大西洋伙伴关系 (TTIP) 的基础架构。在老布什政府时协商，在柯林顿时签约，这个条约是解除关税让出口贸易公司受惠、也损害劳工权益和增加环境

问题的条约。

2014年也代表了Chiapas原住民反叛的第20年。当Zapatistas在NAFTA生效的那天揭竿起义，他们开始为了土地、公民权、尊严、民主、社会正义而奋斗，并且迈向全球抗争。过去些年来，Zapatistas有了批判的论述和组织了跨国的社会运动网络，并有大型的抗争，分别在Seattle, Prague, Genoa等举办高

>>



小区工作：在Chiapas准备有机的萝卜。Markus Schultz摄影。

峰会的地方行动，这些地方都是全球精英谈论世界经济和新自由主义的地方。

虽然媒体没有报导Chiapas，但是若要说Zapatistas运动已经消失，那是错的。抗争仍然持续，只是换了不同的方式。Maya的小区运动已经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自主小区，试验自我治理的草根模式。轮流的地方和区域委员会会员是以mandar-obedeciendo的原则去组织，也就是to govern by obeying。在2012年12月，Zapatistas让大家见识到了其可以动员上万人的能力，并发动无声游行，通过San Cristobal de las Casas。这是高地的主要城市。

过去的夏天，Zapatistas开始了最后一个方案，就是邀请访客到该小区去学习什么自由。「小学校」(escuelitas)说，这个世界不是要去教导原住民什么是发展，而是去看、去听、去学习，看他

们怎么想出新的社会另一个世界，怎么开创自主管理的参与结构。Escuelitas不是长篇大论的演讲，而是第一个从每日抗争的实践中去学习第一手的经验。

而超过1200人，来自各个年龄层，包括墨西哥等全世界的国家，也包括运动者、艺术家、知识分子、农民、音乐家、诗人、小贩、学生等，都前来学习。这个学校不收学费，空间是免费的，交通甚至也免费。出席者只被要求缴100披索(10美元)去印制学习材料，而密封的罐子提供了匿名捐助的机会。Zapatistas解释那些捐献大户不用觉得自己伟大，而没什么钱捐款的也不用觉得羞愧。

会议提供了发问和回答的议会，都是关于Zapatistas的观念和原则，但是最主要的学习部份是在小区里面进行，那里已经规划了数月了。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Votán，或是称为家教，最为这个小

区教学的代表。「没有老师，」Zapatistas的发言人说，「但是有集体的人在教学，形成整个学习和教学的有机体。」

其中一个家教的故事值得一题。一位年轻的Tzotzil代表了他世代的经验。在上了两年的学校之后，他现在自己教书，地点就是该小区的小学。他在Cancún也有过不同的生活，当初因为想要赚很多钱，于是到了大城市工作，当过建筑工人，餐厅、旅馆服务升等等。他说他对城市五光十色、光鲜亮丽生活的向往驱动他这么作，可是他到了那边看到的却是贫穷的多数人和少数的有钱人住在郊区海边。他忍受了这样的生活一年之后，终于觉得够了，于是回到小区，他喜欢有尊严的生活更胜于规训，喜欢小区更胜于竞争。

抗争的20年后，自主的学校系统出现了，而Zapatista的小区制定了课表，这是按照他们的需

要、价值、喜好所制定的。他们一开始的时候盖了一个中学，位于一个区域中心。在那里学生可以待上2的星期，特别是远途的通车生。小学在地方的层级盖起来了。由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担任老师，而Zapatistas认为这个系统远比那些官方的学校好上太多了，那些政府的学校老师都不会说方言，对于到偏于地区教学感到不自在。而Zapatistas的老师偏好去称其为教育推行者，因为他们不喜欢这种由上而下的方式，而喜欢教学相长的模式。他们的教学没有拿薪水，而整个小区也提供了建筑、食物、休息时间、以及衣服的费用。

在小区里面共同生活包括了一起工作、种植蔬菜、水果、游泳、洗衣服、准备食物、然后一起进餐，唱歌，讲故事等等。若要用物质的方式归类，那么这种小区的生活水平是很穷的。建筑物都很简单，而且只有很粗糙的地板，没有现代的射之也没有电。另外一方面，那里却有很多优点，环境清幽，远离尘嚣、工业污染。附近的溪流提供了干净的水。而饮食包括了主要是玉米、米、豆、蔬菜、偶尔有蛋，但是通常没有

肉或是汽水。大部分都是地方生产的，新鲜、有机、好吃。或许最重要的是，这个小区有着尊严，因为其自主性而骄傲。

玉米是Maya的主要作物。NAFTA让墨西哥农民处在和美国竞争的环境里面，而美国的玉米是透过工业方式大量生产的，有着政府的大量补贴。这个带给了那些农民很大的压力，必须放弃土地，然后到大都市找工作。Zapatistas持续种玉米，自给自足，用传统的方式在Milpas种植。那是小的田地，同常在坡地上面，和其他的植物一起生产，像是可吃的野草，黄瓜，特别是豆子，因为可以用玉米梗去种植。而Zapatistas反对基因改良食品和种子，像是那些Monsanto的种子。

主要的转变是在性别场域。革命的女性法律支持性别平等，当这个和传统父权有着很深的切割之后，许多社群采用了，而且更快。例如，当面临了交通和食物的庞大费用之后，那些距离学校很远的家庭必须把小孩送到学校，但是只有男生，没有女生。可是，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人支持性别平等了。例如年轻男性不再认

为洗衣服是女性的工作，而可以自己洗衣服了。类似的，越来越多的女性担任教育推动者，也担任健康推动者，还有自治政府的人员。

墨西哥政府对于Zapatistas的策略性响应随着时间一直改变。本来他们终止了在抗议之后采用的军事行动。最近，政府支持了农村永续城市的建立，必且在Zapatista的农地旁边盖农田，可是保证的工作却不见了，因为补助没有了，那些好看得建筑也都没人进驻，就像废弃的一样。虽然最近有没有武力镇压，当事还是有许多飞机经过。Zapatista认为现在的墨西哥总统因为不公平的的选举和媒体而当上总统，整个政治系统是贪污腐败，所以他们不想和政党合作。

Zapatista的反抗同时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这是关于自治和自给自足的抗争，开创了一个新的新的社会模式，相当吸引人。他们对于社会正义的答案起于自由。他们不要求允许，但是他们愿意实践。建构性的调整政策已经让都市的贫民窟越来越多，全世界都是。现在是时候去用新的发展方式，游下而上去创新了。全球社会学和关注不平等的社会学透过去看全球南方的草根例子一定可以受惠良多。■

> 叙利亚的监狱

去连结和去主体性

by Abdulhay Sayed, formerly with the University of Damascus, 叙利亚

有一个报告是由卡达所资助撰写的，也是由前联合国检察官独立所写的，在这份报告中，

齐分析了上千张照片，照片是关于许多受到酷刑、饥饿对待的尸体，他们都是叙利亚的囚犯，这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去发掘所谓的大规模屠杀杀囚犯的现象。这份报告也由叙利亚的民间人权组织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其描述了现今叙利亚监狱的惨无人道的状况。这篇文章将聚焦在当事人证词而非图像。的确，现在有许多证词的档案，我关注在囚犯如何生存、如何受到虐待、如何濒临死亡、如何看到其他人在死前的去连结化。我问一个问题，就是在什么样的程度上，他们有历经Muselmänner的状态，也就是Auschwitz集中营生还者Primo Levi等其他人的经验，这由Giorgio Agamben形成了典范，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现在在叙利亚监狱的去连结化悲剧，以其叙利亚政治空间的灾难。

对于许多生还者而言，有越来越多的囚犯，特别是些因为和平运动而遭逮捕的人，会在监狱中死去，然后秘密被埋葬。这写证词经常地指出囚犯怎么面临有限的空间和过多的监禁人口。而刑求

的状况变得越来越规律。暴力和不人道的对待并不只出现在审问时期，也出现在生活中。

由叙利亚草根人道组织Violation Documentation Center (VDC) 一由律师Razan Zeitouneh所创立一所收集的数据可以看到，狱吏时常用饥饿对待的方式让囚犯崩溃。饥饿被用来当作刑求方式，也是让生还者永远无法忘记囚禁痛苦的方式。艰困的囚禁环境通常造成“去连结”，这里是一个在Damascus的Qaboun的生还者所描述的许多人的遭遇：

我被放到一个5公尺的房间，大约有180个囚犯在那，他们都是“去连结化”的人。这个词我们用来只那些行为因为刑求和高温所造成的行为崩溃的人。我们每天会看到一或两个人去连结化，原因包括心里压力、湿度、高温等等。囚犯会因此开始胡言乱语、失序…

当一个去连结化的囚犯死了，会有一个系统化处理尸体的方式，把他消除。在某些监狱中，这个行动是由资深的囚

叙利亚雕刻家 Fadi Yazigi用青铜造的作品：树。



犯去执行，因为他们被强迫去处理这些尸体和带走。在其他监狱，这个等待死亡的地方通常在洗手间旁。这些生还者的记忆指出，这些去连结的囚犯就在等等他们缓慢的死亡，这里有一个生还者所描述的景象：

每天大约20个左右的囚犯被赶到走廊，去面对缓慢的死亡。这些个案从被虐待到快死，到高温快热死都有，就像行尸走肉一般。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大小便，充满血汗粪便。他们都快死了。他们的眼睛虽然张开，可以看，就像是要要求其他还可以走动的人去揭露这一切给外界知道。

一个人特别会被这种延长的瞬间和囚禁的经验所冲击，而且当心智已经被去连结的时候特别如此，因为整个身体在一种最地限度的状态，濒死之前的状态。人很显然要在Auschwitz集中营，有就是Agamben最近在2005年的书Remnants of Auschwitz所说的Muselmann中划上一条并行线。Primo Levi作为Auschwitz的生还者被称作SS也是Muselmänner的囚犯，其描述是很有画面的：Muselmänner不是人类。他们无声的走动，身体衰变，头低落，肩膀弯曲，眼睛无神。跟具生还者的证词，Muselmänner的人就是活着的死人，行尸走肉，木乃伊人，跟在其他集中营一样，只是称呼不同而已。我们对Muselmänner的研究其实很少。

透过Muselmann的概念，Agamben对于两个相关的问题很感兴趣：在集中营的经验如何可能，以其纳粹是在那里歼灭有囚犯和证词的？此外，纳粹政府怎么去主体化人类？Agamben显示了透过饥饿化他者，让他者达到Muselmann的程度，权力就站在时间这边。这建立了生与死之间的第三领域，也是透过去主体化的过程，把人话约到生物性的存有，权力让他们在这个层次生存下去。

虽然一个人想要在去连结和去主体之间划上并行线，也就是在意识和生物之间区隔开来，这通常会在此停住，的确，在Auschwitz的Muselmann和叙利亚之间有许多不同。Muselmann是Auschwitz的意外，因为其目的是歼灭。可是叙利亚的去连结化是政府的核心角色。去链接化的图像作为主要的功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这必须进到生还者的经验之中才得以可能。这些证词构成了去链接的整个完整图像。没有所谓“没有生还者的去连结”，也没有“没有去连结的生还者”。去连结的经验必须由生还者提出，然后让叙利亚人民感觉到由衷的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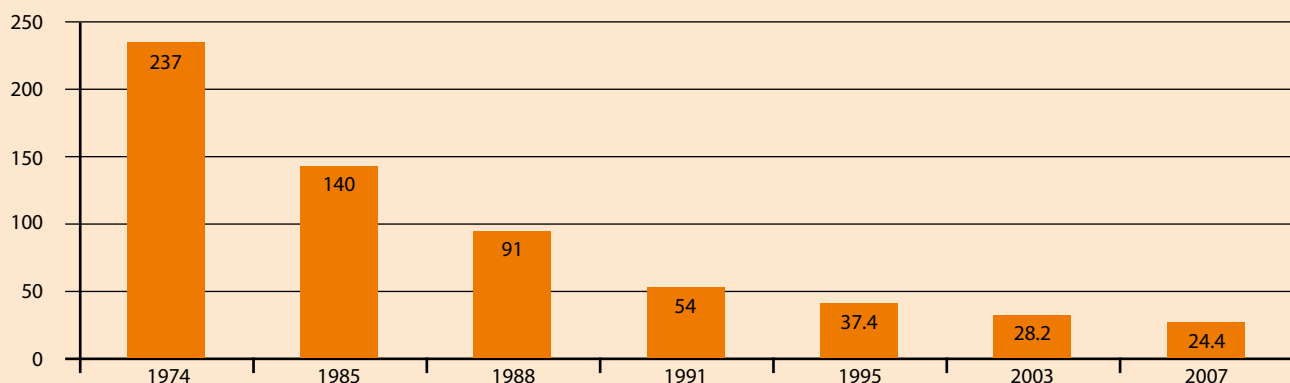
近一部而言，muselmannization是叙利亚囚犯所展示一个政权如何代表和处理政治空间的例子。这个政府的权力机器不是主要用来消除人民分类的，而是去除人民的能力，让其没有能力去反对，没有能力在公共空间行动，借着用把人民化约成生命政治的单位，或是一种可以任意丢弃的人口，去达成那些目标。个体层次的谋杀和移除不是这个权力的目的，这只是手段，这种手段用来臣服社会。面对和平的社会运动，政府逮捕示威者然后把他们丢到监狱，剥夺一切政治权利、然后去连结化，丢弃。

一个人可能去在叙利亚监狱的个人创伤和叙利亚政治的身体政治中平行移动吗？这里刑求、那里毁灭城市。把囚犯带到这里连结化，而让在公共场合和平集会的人民主体消失。爱这里堆积尸体、在那里驱散人群。当然，这在理论上是平行的时空，但是这真实再现了叙利亚的悲剧情况，并且政府系统化的摧毁这个国家人民的自由。■

> 伊朗女权的进步？

by Shirin Ahmad-Nia, Allameh-Tabataba'i University, 伊朗

伊朗女性死亡率1974-2007



Source: "Health Profile Indicators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Center for Health Network Development & Health Promotio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Medical Education, 2009

伊朗的社会从1979年革命以来历经了巨大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变迁，最明显的是家庭、教育、都市。

在革命以前，伊朗有少于一半的人口住在都市（47%），而按照上一个国家人口普查（2011）指出这个数字现在是71%。超过50年来（1956-2011）的都市人识字率从39%增到88.9%。而性别差异在中等和高等教育的领域也减少很多。

统计指出，大约十分之一的家庭是女性领导，而单身、离婚者

也增加很快。可是，伊朗的文化反对女性进到劳动力市场。传统价值支持性别隔离，男性是唯一的家长，可是女性即使机会变多了，但是就业者只有12%，和革命前相差不大。这和女性的教育程度增加以及大学毕业生增加的景象差距甚大，许多领域中失业率甚至女性是男性的两倍。

尽管对女性有歧视，女性的高等教育取得增加了接触国际媒体的机会，信息和通讯科技的普及也带来了文化全球化，因此她

>>

们熟悉新的价值和理想、生活习惯，多元文化等等，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年轻女性的认同。

年轻一代的女性已经重新定义性别认同，不同于传统的母亲或是妻子的角色只能参加小区文户活动，年轻人开始进入经济领域。进入公共领域，尽管有文化差异，这都培力了女性，让她们经济自主。随着增加的潜力和能力，年轻女性可以作主自主选择，创造新的家庭图像和生活方式。

当早婚（大概在青春早期）是传统价值所支持的时候，在 Shah 的时期这个政策几乎没变，而经过了五十多年结婚平均年龄从 18 增加到了 24 岁。同时，家庭的规模也减少很多，从 4.8 到 3.5 人。生育率也下降到 6 人到 2 人，全体人口的增加率从 1955-65 年的 3.91% 到 2011 年的 1.29%。

因为家庭计划在 1989 年重新开始，结婚女性使用避孕的比率增加到 74%。这个减少了生育率和非意愿怀孕，而每十万人的孕妇死亡人数也从 237 人减少到 21 人。这个进步也反应在平均女性寿命，到 2011 年增加到 75 岁。

这个社会文化变迁也对独立择偶、婚前性行为，家庭分裂有关，择偶现在发生在大学、工作场合、公园、购物场、网络、聊天室、街上、宗教庆典上，年轻人只要有空间交友就可以发生。结婚不再被长辈所限制，而高离婚率（Tehran 于 2012 年 1/3 的离婚率）也增加了非典型关系的数字，像是非永久伊斯兰婚姻 Sighe or Mot' e 对于高危险性行为、婚前性行为、婚外情的回应。

有很少的国家层次研究聚焦在性和生育健康议题上，特别是青少

年。可是证据指出地方上性经验年龄下降到很低。此外，非传统的关系也导致高危险行为，让年轻人口暴露在性病 HIV/AIDS 的风险下，这些都和休闲的生活习惯改变有关，鼓励了现代消费，可以轻易买到酒。这些都不被宗教和法律允许，所以也显示出了警讯。■

> Euromaidan

反叛运动

by Volodymyr Paniott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yiv-Mohyla Academy, General Director, Kyiv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ology (KIIS), and member of ISA Research Committee on Logic and Methodology (RC33)



乌克兰摇滚乐团, Okean Elzy
[“Elza’s Ocean”] 在12.14.2013的
Maidan运动上表演。

“Maidan”是个特殊的社会现象，“暴民”、“聚会”、“示威”等词汇都不能精准描述。技术上，Maidan指的是Kyiv的独立广场，但是现在被用来指涉那些被运动者占据的建筑物和城市。整个Eu-

romaidan 现象包括了4个时期。

> 第一阶段：抗议开始

乌克兰和欧盟原来已经准备11月28-29于Vilnius的东部伙伴关系高峰会签订联盟协议，而让乌克兰人民

惊讶的是后来政府取些签订了。而Maidan第一次聚会是在11月24日，有5-10万人参加，这是2004年橘色革命后的最大抗议。欧盟的支持者开始在街上搭帐篷准备长期抗战。从Maidan之后，乌克

>>

兰人用这个字代表广场。而接下来则用 Euromaidan 称呼。

> 第二阶段：攻击抗议者及改变

在 11 月 30 日，上百警察，也就是 Berkut，使用武力驱散示威者，许多是年轻人。这早成很大的冲突，示威者被驱离 Khreschatyk，也就是主要街道，然后圣麦克天主教堂的修士打开们让大家避难。

这些事件引起了公愤。虽之接下来的星期日（12 月 8 日），一群大约有 70 万的示威者和上百万民众到了 Maidan 然后占领街头，包括 Kyiv 和西边地区，到了这里的人是要做什么呢？民主基金会做了调查，是由 Kyiv 的国际社会学机构 (KIIS) 在 12 月 7 日和 8 日发起的。还包括 1037 个亲自访谈。后续调查在 12 月 20 日进行，那天是周间，包括了许多运动者。

有必要说几句话关于方法论的部份。我们发现这个出口调查和街道访谈不是很适当，因为人数一直在变，介于五千到两万人之间，后来 10 万人参加了周日集会。所以我们的方法

需要调整。我们的抽样选择了几个区块去进行随机抽样，然后在某个特定时间做出口民调。对于 Maidan 的运动，我们把访谈点化分为几个时间点，然后去访谈那些离开建筑的人。访谈人半径 3 公尺之内的人的会访谈，可是实际上这个界线是看不到的，而监督者会观察整个访谈，照相，然后对样本进行加权。

两个动机让大家去参加运动：运动于 11 月 30 日遭到暴力镇压（70%），Yanukovych 的拒绝签署协议（54%）。其他动机还包括了要改善乌克兰的生活（50%），以及改变国家的结构（39%）。Maidan 的受访者则说诉求包括了：释放被捕运动者和停止镇压（82%），政府下台（80%），Yanukovych 要辞职（75%），和欧盟签协议（71%），开启镇压示威者的真相调查（58%）。总之我可以说主要的要求是正义和人类尊严，这也是为什么记者说“尊重革命”。

或比较 Maidan 运动和 Maidan 抗议，前者大多从 Kyiv 之外而来（81%），而后者多数是 Kyiv 居民（57%）。在非居民中，从西乌克兰的

人占了两者的多数（42 前者，52% 后者），代表了运动里面有比较多的非居民。而参加者的教育程度很高：有 64% 人有大学学历，没有的 13%，而占领者里，60% 是专业者，创业家、管理阶层。换句话说，参加者主要是中产阶级。而运动者里面的专业者较少，少于一半的抗议者，而大学毕业生也少于一半。

> 第三阶段：激进化

Maidan 运动持续了好几周，但是诉求不被听见，持续有人被捕。抗议者住在零下 10 度的环境里面，于是激进化了。在 12 月 16 日，议会通过了更严格的法律惩罚抗议人士（被记者称为独裁），公众的愤怒一触即发，抗议人潮游行到议会，被警察挡下。在 Grushevskovo Street 的冲突里面，许多人受伤和死亡，警察把人带去森林里面痛打一顿。有人的尸体被找到，许多人失踪。

2 月 3 日，民主联盟和 KIIS 重做了一次调查，前一次是 12 月 20。在这个为期一个半月的占领运动后来变成了武装基地：Maidan Sich。Sich 指的是 Zaporozhian Cossacks

>>

象征乌克兰独立。武装者越来越多，那些要冲进政府大楼的人从38% 增加到了56%，那些像要占领的人从19% 增加到了41%，而要武装的从31% 增加到了50%。民调和媒体报导都指出了激进化现象，而对运动的态度则依地区而异。一项由KIIS从2月8日到2月18日做的调查中指出所有乌克兰包括Crimea里面的人有40%支持该运动，总数是2032。但是从东部到西部数字从8% 增加到80%。

> 第四阶段：暴力镇压与运动的胜利

2月18日，激进化快到高点了，Maidan运动被警察包围，狙击手就定位，冲突于是爆发，持续数日，只有在2月19到20日有中断一下。攻击武器两边都出现，在这3天中，超过100位的抗议者被杀或死亡，5位警察死亡。此外，超过1500的人受伤，300失踪下落不明，这是国家的悲哀。2月21日，议会

> With which side do you sympathize in the current conflict in Ukraine?

PERCENTAGE SUPPORT FOR	REGIONS				
	Ukraine Total	Western	Central	Southern	Eastern
Government and Yanukovich	23	3	11	32	52
Protestors	40	80	51	20	8
Neither side	32	13	33	42	39
Hard to say	5	4	6	7	1

里面有政党成员支持运动，投票要取消镇压，把警力送走。

同时，波兰、德国、法国、俄国的代表、总统 Yanukovich 签署了协议，但不解决危机，可是，同一天晚上他就消失了，大家发现他逃到俄国。所以议会组织新的政府，宣布总统改选。这一切依照宪法。而议会主席暂代总统一职。乌克兰政权从此变天。■

3月9日收到稿件。

> 革命还没开始

by Volodymyr Ishchenko,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yiv-Mohyla Academy, an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Society Research, Kyiv, 乌克兰



24

运动的激进化，特别是在国会通过限制集会的法律后，1.16.2014.

由东部和南部乌克兰所谓的“分离主义者”所发起的事件正在快速发展之中，其中俄国军队也介入 Crimea 的事件，而这时候所有试图想要一般化的理论企图都只能是暂时的。总统 Yanukovych 的政权被推翻了，而新政府已经掌控了整个乌克兰，

并宣布了第一个政经改革方案。

许多分析家和运动者已经把整起事件归类成“革命”：“民族”、“民主”、“反殖民”、“布尔乔亚”等各式各样的革命。不过，事实上就是有一群乌克兰人发起了一场反叛（主要是西部和北部的人民，而且南部和东部的人并不支

>>

持)，而且几乎群龙无首，由政党把持，包括了好几次的警察和民兵的流血冲突。结果是统治精英的汰换。虽然某些政治学者宣称这已经是 Tilly 式的革命了，⁽¹⁾但是，统治精英下台的结果其实未必符合革命的定义，因为革命寻求的是更根本的制度与结构的改变。

而这场反叛事件会带来乌克兰的阶级或经济的改变吗？经济事实上还掌控在同一群人手上，就是金融与工业的团体，他们和国家关系紧密。此外，现在他们的权力更甚从前。乌克兰的“巧克力”国王 Petro Poroshenko（在 Yushchenko 和 Yanukovych 政府都有任职）已经是总统选举最有可能出线的候选人了，而为了要在反对他的东部地区建立统治正当性，新政府指派了最副有的人担任那些地区的地方首长（Ivan Kolomoiskyi, Serhiy Taruta）。

政治或许变得更多元，但未必更民主。Yanukovych 家族想要独揽大权的野心已经被更集中的寡头精英索取带，虽然新的 2004 年宪法给予议会更多的权力，削减总统实权，但是还是没有比较民主。议会选举将会以比例代表制为主。而宪法也没有提出任何方式给予人民去监督那些政党候选人（像是透过党内初选）。所以政党领袖有不受拘束的权力，可以决定候选人名单，并可以开除异议者。所以这种议会制有可能回重蹈 2014 年 1 月 16 日的覆辙，也就是当初违宪立法限制了人民的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

Maidan 运动的其中一项诉求是：让人民走上街头的原因，以及新政府必须快马加鞭去做的，就是政府的透明性。这个议题不能忽视，也不能因为这是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就反对之。建立一个有效和透明的政府制度是乌克兰的一项大突破。然而，可是这也不可能在忽视不平等和贫群问题的情况下达成。现在我们只有看到往返方向走去：政府已经宣布同意 IMF 的所有撙节方案，因为政府急需贷款，可是这样只会恶化不平等。此外，任何追求透明政府的努力都会被寡头所拒绝，因为他们得到了许多利益，

并且在竞争中总是可以得利。国际竞争势能限制乌克兰资本主义扩张的最强因素，因此保护国家的重要性正面对了欧盟和俄国的竞争。矛盾的是，乌克兰的反殖民革命似乎增加了其经济的依赖程度。

在国际的支持下，暴力被视为是和 Yanukovych 政权对抗的有效办法。⁽²⁾然而，也有许多不好的后果。那些人里面也有“右翼”，包括了新纳粹，并在外围迅速崛起，几个月内变成很有影响力的一群。可是这些抗议者并不像俄国媒体和左翼团体所称的“法西斯”，因为法西斯是由上而下、有组织的武装占领，这在乌克兰并没有发生。右翼和整起运动都不受政党所控制，并且取得武器，受到人民的支持。

就像过去的革命一样，外国的介入是主要的因素之一，导致了孱弱的解放能力，然后民族主义者把民主和社会的能量压缩了。因此，社会经济的反叛如果再发生一次，反对新政府的撙节和寡头，那将会是由极右翼所领导，不会是新左派。如此一来，在这个文化分裂的国家，更广大的运动会没有空间展开，并且在没有社会改革的基础下，国家将分裂。■

2014 年 3 月 9 号接受稿件。

注 1：<http://www.psa.ac.uk/insight-plus/blog/ukraine%E2%80%99s-euromaidan-tillyan-revolution-can-lead-second-crimean-war>

注 2：<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monkey-cage/wp/2014/02/26/why-ukraines-yanukovych-fell-but-so-many-analysts-including-me-predicted-he-would-survive/>

> 改变人类的发展

by 李远哲，国际科学理事会会长(ICSU)，前中央研究院院长，台湾；杨为植，ICSU会长特别助理。

“Neither gradual progress nor incremental tinkering will suffice”

多年前我们讨论过透过限制发展避免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危险，当时一位非洲代表发言说：“不，我们国家的人民穷困潦倒，我们需要发展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若是发展意味着毁灭地球的话，那我们就一起同归于尽！”

这句话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们越是拒绝这个同归于尽的论调，就是越彰显了这个事实：这世界上还有很多穷人需要更好的生活，因为人皆生而平等。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世界上还有 13 亿的人无电可用，25 亿的人每天只能用 2 美金过活，可是那些富有的人却挥霍无度。

没错，这些人消耗了太多的资源了。我们人类每年超用了地球生产资源的 50%。

(1) 在 2012 年有 105 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发出了这样的警告：过度消耗和人口过剩是地球对大的敌人。(2) 若我们继续现在的生活方式，科学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纪地球将会升高 4 度，气候会骤变，物种会灭绝、灾难将会吞噬所有人类。(3)

这是 21 世纪人类的困局：资源和能力都有限的地球却要消化掉这过度浪费的人类生活。这 70 亿的人用掉太多有造成太多的困难了。其中的 25 亿人应该受到更公平的对待。而 2050 年之前，人口会还多增加 20 亿。

> 如何增进人类福祉却又不浩劫地球？

若要说现在的发展模式很好，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70 亿的人采用这种模式，那就是带来痛苦和环境浩劫。若有 90-100 亿的人用这种模式，那地球就会毁灭。

> 要有新的办法

若要让每个人在地球的有限资源前提之下都可以有尊严的生活，那我们唯一的会是彻底改变我们现在的发展模式。渐进发展模式是行不通的，唯有彻底改变才是出路。人们或许会问：那种真正永续的发展模式到底是什么？答案可能是复数的，而且要人们一起集思广

益。无论如何必须满足3个目标：

——永续的环境必须让地球有能力承担全人类的生活，人类的未来端赖它。

——永续的环境必须限制成长，包括了人口和消耗，因为无限的成长不可能发生在有限的地球上。

——永续的环境必须平等，因为唯有平等才可以发展出一种新的所有权概念“这是全人类的地球，我们都必须为它服务。”

一言以蔽之，永续发展是兼顾现在与未来的需要，并平均地分配有限的资源。

► 社会学家怎么参与贡献其中？

问题应该这么问：若连社会学家都无法做出贡献的话，那还有谁可以呢？这个地球的危机，根源并不在物理，而在不永续的人类发展，也就是人类的制度、行为、价值。换句话说，这是正是社会科学长期以来所关心的，也是真正的战场所在。

“那自然科学和科技的角色为何呢？”你或许会好奇问道。没错，科学家对于低碳社会很重要，但只有科学并不够。事实上，科学和技术已经是资源剥削、过度消耗、崇拜成长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都是人们和各国梦寐以求的事情。只要各国仍然不放

弃这种想法，就算绿科技实现了，地球还是负荷不了。

但若我们可以转变这种想法、价值观、行为、制度等，我们就可以改变科技所带来的结果。社会科学不仅仅有关，而且还是至关重要。有三个可介入的领域如下：

1. 我们“发展”和“需要”的观念：永续发展的定义（从1987年的布伦特兰委员会而来）并没有告诉我们何谓“发展”和“需要”。那什么是发展？是挥霍的西方生活模式，还是快乐的自足生活？那什么是需要？一个睡觉的人只需要100瓦特，而美国人平均要10000瓦特，瑞士人说只需要2000瓦特。那什么又是适当呢？

这些问题都很难回答，但是不回答就意味着“都可以”，包括了夸张的浪费资源也都可以。透过共同的努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等等可以想出更好的答案。

2. 人口：2050年前会有90-100亿的人口，可是这不是密度。密度被社会规范、经济、父母家庭、政策等影响，这是未来社会科学可介入的地方。

3. 全球合作：我们的民族国家体系已经证明很不适合用来一起面对全球气候变迁了。我们需要更好的全球制度。现在应该很严肃地应用社会科学所擅

长的制度设计来处理当前的危机。

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对于改变人类发展模式可谓潜力无穷。可是除非我们把潜力转变成真正的行动，否则只是枉然。我们最好马上开始行动，因为科学已经预见若是再不动，那么就太迟了。那下一代会怎么看我们？

在本文开头提到的会议2年之前，其实大家都有共识，都希望找出不同的发展模式，那就是另一种更平等、更把地球有限资源考虑进去的方案。■

註 1:Global Footprint Network:
<http://www.footprintnetwork.org/en/index.php/GFN/>

註 2:Inter-Academy Panel, Statement on Population and Consumption: <http://www.interacademies.net/10878/19191.aspx>

註 3:The World Bank, Turn Down the Heat: http://climatechange.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Turn_Down_the_heat_Why_a_4_degree_centrigrade_warmer_world_must_be_avoided.pdf

註 4: Griggs D. et al., “Polic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for people and planet”, Nature 495, pp. 305-307, 21 March 2013: <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495/n7441/full/495305a.html>

> 气候变迁

市场决定人类的命运

当温室气体排放量在联合国协商平台后的20多年后还持续增加时，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越来越依赖市场来解决全球暖化的问题。可是另外有国家和社会运动反对这种作法。Herbert Docena这里为我们带来联合国气候暖化会议(2013年11月11-22日于Warsaw)的报导。



在 Warsaw 的运动游行，在联合国气候变迁中心前。

已经连续第二年在联合国暖化会议前夕有超级台风出现了，这次是菲律宾首当其冲。对于在 Warsaw 开会的各国领袖而言，气候暖化正在发生已经不容置疑了，并且那些排放最少温室气体的国，受到的灾害却最大。

此外，Haiyan 台风和其他的超级飓风一样，再次证明了这点，许多国的代表也都说联合国协商平台彻底失败了。虽然说协商会谈持续进行，可是却往很危

险的方向去。已开发国家比以往更团结一致地依赖市场机制去解决暖化问题。不过全球的社会运动可不会就此坐以待毙。

> 责任问题

Warsaw 会议其实不过就是另一场自从 1972 年以来在 Stockholm 讨论全球生态



与会者的非正式会晤，形成结论。

危机的会议罢了。在 1992 年，多国政府签订了公约要“稳定温室气体排放量以防止人类破坏气候结构。”

可是这么简单清楚的任务执行起来却很困难。原因就是这其实要改变的，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从电灯泡到一国的能源基础结构，都要改变。有些人则坚持整个资本主义都要替换掉。而就像许多的改变一样，这个改变也会让某些人得利、某些人受害。

不过基础的共识仍有，就是以开发国家必须带领减少排放量。可是因为就算所有的已开发国家都做了，还是不够，所以开发中国家也被要求加入，并且已开发国家要提供必要的科技协助。此外开发中国家也比较容易受到伤害，所以也必须协助其评估处理整个的影响。

这些则是越来越难达成，因为在这共识的台面底下有更深层的冲突，包括了不对等关系、分配、利益等等，也包括了人们对于行动的意义和和其他人的社

会网络，冲突像是什么人该受到什么样的对待等等问题。

开发中国家因为害怕要必须承受所有必要和不必要的责任，他们坚持富有的国家必须有所谓的道德责任，因为历史上看来他们本来就是要负起比较大的责任。已开发国家需要受到强迫和限制，因为只是邀请或是引诱他们去做，那不太可行。

几乎我所访问过得的已开发国家代表都很生气的拒绝这项要求，认为不可能要他们对全部的结果负责，特别是那些他们并不知道的部分。若他们现在会想做更多，那绝对只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领导权力，而非感到罪恶。他们并不是那种可以惩罚的人。对他们能做的只有鼓励。

> 发展问题

另一个复杂的问题是在这些努力的另外一面还要顾及如何永续再生，以及这

>>

是不是可以被当作目标的问题。这在经济倒退的年代尤其重要。

在 70 年代许多团体批判资本主义，而联合国、世界银行、环保团体、资本家对于日渐增多对于环境运动风起云涌的响应是“永续发展”，也就是解决环境问题和经济发展可以并行。

这似乎已经变成的理所当然的常识，也是许多国家的目标了。其他组织和公民社会也同意这点。这所需要的，据他们的说法，是“全球环境治理”，带来更多对于使用自然资源的管制。但是对于结果却意见不一。

极端上而言，美国支持新自由主义的管制：市场应该成为管制者。国家也只能被要求自愿去管制。而且不能有所谓的由上而下的方式去执行。对于更高收益的承诺就是让资本家可以绿化的方式，要他们投资干净的能源技术。

另一个极端则是欧盟的方式，一种比较像是社会民主的方法。国家要担负起更直接和主动的角色去限制气体排放，然后协助投资干净能源产业等等。

而对资本家而言，主要的分歧在于有两种资本家：传统能源产业和绿能源产业。后者像是那些再生能源、碳交易、以及所有关于气候变迁的商业机会。前者在美国比较容易有人支持，后者则是在欧盟找到盟友。

开发中国家总共有 130 国，歧异更大。不过他们大多同意重分配的正义必须是解决方式的核心所在，而国家的管制和惩罚（罚金、课税），以及对市场的管制等也该采用。

可是内部仍有分歧。在更大的目标上，许多国家可以来支持永续发展，这也是北方所实行的，可是有些国家把焦点放在保护自然而非维持资本主义运作。

> 失败的妥协

在协商的早期，新自由主义的方式主要由美国提出，但由于欧盟和其他开发中国家的反对而中止了。接下来的就是市场机制的妥协，在这之中已开发国家必须要限制其排放量少于 1990 年的数

字。若是建立了更多的碳市场，那么就可以有更多的排放量额度。

在 1997 年的东京议定书中，这项共识似乎被美国和欧洲领导的已开发国家接受，因为这是市场机制和排放量管制的结合，但也因为他们都宣称自己是无辜的：不像开方中国家所支持的方案去惩罚一样，这种市场机制方案让他们并不会受到惩罚。

许多人反对这种市场机制，并对低标准感到不满，发展中国家会签署的原因是因为这至少有约树立，而且他们置身事外，还有可以透过市场得到科技协助。可是这对美国来说却是太过投了，因为美国从中看到了对其自身利益的威胁，也看到了美国道德宣称的矛盾：他们很罪恶，可是该负担的责任却不能多于其他国家。美国结果并不履行协议，许多国家也跟进。

在超过 10 年的实行之后，进展非常有限。许多国家打算减少排放量，可是只是因为经济萧条或是可以从碳市场上得到更低的买进价格。总体来说，排放量比起 90 年代高出了 60-70%，而且开发中国家并没有得到什么科技支持。

随着协商的进行，其实过去几年都在原地打转，这次在 Warsaw 已经在寄望最有权力的巨贾可以把协商带往新的方向上。“我们可以解决这个气候问题，”菲律宾的代表这么说。

> 迈向灾害

协商平台一直重复以前被否决的事情。不像以前由美国领导的群体和欧盟想要各行其是，现在他们可能会结盟了。因为即使是欧盟也同意美国了，或是至少没办法提出 90 年代那种可行的替代方案了。

他们不断的在协商平台上重复说：减少排放量的方式是要求国家去刺激市场，投资绿能源产业，并把自然资源定价。够过这种碳市场的扩张与连结，开创“被赋权的环境”，并透国投资的政策和补助一起执行。这当然都是由上而下的作法。

这个任务如加拿大代表所说的，就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所释放出来的讯息就是“气候变迁有商业利润”。从事相关生意的人透过“永续发展”的逻辑，认为他们必须受到礼遇，而非谴责，因为他们才是保护环境的人。透过市场就是透过他们去保障人类的未来。

可是这转向了更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并看起来被反对派注意到了。尽管内部有分列，外部也有压力，许多开发中国家仍然结盟，坚持国家而非市场必须确保排放量比须减少，资源和科技必须继续重分配。

至少部份的不妥协可以被看成是左派和左倾政府，像是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等等的声音。虽然这些声音还是持续被边缘化，协商平台上的这些国家似乎越来越可以阻止已开发国家的“碳市场连结全球”计划。他们也是反对市场机制的主要行动者，这或许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

“公民社会”也看起来相信了。大约800个NGO团体、贸易组织、社会运动代表的都站出来抗议这个市场机制的方向。这一切看起都像是在展现不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商人去决定。可是除非开发中国家和社会运动可以有真的影响

力，可以影响决策者，明确订出多少能源可以产出，否则世界就是每年增加4度，Haiyan会越来越多。比超级台风更大的力量正在左右人类的命运。■

> 中国都市化的 戏剧性与破坏

by 周飞舟，北京大学，中国



农民的未来就被困在城市开发里面。

而土地权不论是以使用和收入来衡量，都是平均分配给村民。每个村的农户可以收到了几块农地，但总是有一片地是邻近家庭的。而搬到公寓之后，住所和农地的距离就拉大了。村民总是要走上一、两个小时的路才可以到那。所以后来地方政府也把一大片土地租给都市企业去种植经济作物。在成都，土地的出租价格大概是每亩800-1000人民币，相当于农民一年的作物收成价格。所以，当农民搬走以后，农地就便成了都市企业所接管，传统家庭农业也变成了企业耕作模式。

公寓的生活也大大转变了农民的生活模式。一方面农民没有土地可以耕作了，没办法种菜和水果，或是养牲畜，像是养猪或养鸡，租金是唯一的收入。另一方面，村民开始也要消费去负担给处生活开销。根

自古以来成都平原就是人口稠密的农业地区。在2007年的时候中央政府选择了成都市作为“协调城乡发展的先导地区”，这个计划的目标是要改变都市和乡村的关系。成都的改革计划对于其他地方有很大的示范作用，而且自2009年来也成为研究、学习、模仿的对象。其中计划最主要的核心部份是鼓励农民迁出分散在各地的乡村，然后搬到政府盖的大楼公寓里面。每个公寓可以容纳100

到500户家庭，这等同于3个乡村的规模。这些计划都有配备基础的设施，像是水、电、瓦斯、道路、垃圾场、健身设施等。而生活水平也和乡村的平均看齐。所以这个计划被地方政府称为“新乡村建设计划”或是“城乡发展平衡计划”。可是，有些媒体称之为“乡村消失计划”。

同时，农业发展也正在历经转型。从1980年代的去集体化改革以来，农业实行了“包产到户”，

据我们在成都的调查发现，农民在公寓的生活开销平均提高了30%。不只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也改变了。虽然长远的影响现在还不清楚，可是要厘清整个图像，还是必须放回到整个中国的快速都市化脉络下来看。

中国的土地制度有两种的产权：集体的农地产权和国有的都市产权。若城市需要农地作为都市发展建设，那么就要马上转换产权，从集体到国有，这称作“土地征用”。只有地方政府有权征用和卖土地。

地方政府也可以从“土地出让金”从获取高额利润，也就是征收农地转卖给都市开发公司。2013年，整个中国的土地出让金总额超过了4.12兆人民币，占了59%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同时，因为地方政府可以像都市开发课税，这是1994年税改后的政策，他们有很大的动机去争取都市来开发农地。这个部份的税和土地增值税一起，就是土地财政的基础。

除了利用非政府的资本作为都市开发的筹码之外，地方政府也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而且这是超出其财务能力之外的事情。就法律而言，地方政府收取都市建设的租金是违法的。政府部门非但不可以获取租金，而且也不能担任保证人。然而在实务上地方政府总是利用政府财务资源去帮助国有企业，像是都市投资发展公司，都市交通公司，都市水利工程组织，土地保留中心等。这些企业都是由地方的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所营运的，是地方政府的一

部分。其主要的功能就是取得银行贷款，然后投资都市建设，并用政府所转让的国有营建土地向银行抵押。几乎所有的县市都有这类的公司，也称作“地方融资平台”。这些金融平台可以得到抵押土地价格70%的金额，然后投入都市开发。一项中央政府的调查指出，地方政府在2013年6月为止共负债17.9兆人民币，多数来自于融资平台。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会发现，中国的都市扩张背后其实是有其土地和财政等制度的作用才得以可能。首先，地方政府可以透过征收得到国有土地，然后投入都市开发和卖地获取利润。第二，在地方金融平台上，地方政府可以使用土地作为抵押然后像银行贷款。土地和财务的双重结合带来了迅速的变化，所产生的都市繁荣景象和一般过去以工业化为基础的都市化结果并不相同。

这个新的都市化关键在于获取充足的国有土地向银行贷款，然后开发。可是，中央政府为了保护耕地和食物安全，其控制了农业用地的总量，限制了地方政府的开发。成都改革体现了这两种矛盾的力量：土地征收的严格控管，以及基于都市化需要而大量索求土地。

在中国的农村，宅基地是不属于耕地的。传统上，农人总是拥有很大的宅基地。成都计划让农人搬到公寓里面的动机之一是去“生产”更多的都市土地。农夫搬走后，宅基地变更为耕地。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可以使用这种耕地的增

加来获取都市化所需的用地。例如，若农人搬走之后，乡村就可以变更100亩的宅基地为耕地，然后地方政府便挪用这100亩当作都市开发用地。而同时耕地的总量并没有改变。

总地来说，农人居住的变化，就是从宅基地搬到密集的公寓区块，这也是中国农村都市化的源头。若是农人不放弃其宅基地，政府就不能征收耕地作为都市发展和向银行贷款，而都市化的脚步就会减缓些。现今的成都计划已经成为了许多其他地区的模范，都市扩张的速度更是前所未有的快。■

> 土地掠夺与贪腐

by 张永宏，中山大学，广东，中国



深圳抗议贪腐的标语。

在这波中国史无前例的都市化过程中，大片的土地被征收去作为都市开发之用，农村集体产权的分配和管理于是成为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在1990年代早期，东南沿海的都市化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要来的迅速。而地方政府的治理也使得都市外围乡村的集体土地逐渐被分配给个体户。但是在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

权制度没有改变的前提下，这些村民建立了“小区股份公司”，村民变成了土地持股者，然后可以获得报偿。

小区股份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地方政府为了要在不激烈改变人民公社时期所留下的权利结构前提之下进行都市化。公司董事是由村民互选而成，但是选举结果很大的程度是被地方政府和乡村派系所决定的。许多的农村干部理所

>>

当然地变成了董事长，独占了政治、经济、社会的权力。而公司也由于介于在地方政府和农村之间，遂变成了政府的工具，用来解决都市化过程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举例而言，公司不但管理整个集体产权，也代表政府去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安全、福利、环保的政策。

虽然乡村委员会和公司都是所谓的草根自发性组织，但是地方政府和地方派系的影响凌驾了村民自主的原则。结果就是造成公司董事长和地方政府的合谋，并掠取了更多的土地。

最近几年来由于土地不断的增值，董事长就可以藉由卖土地而大赚一笔。这个现象导致了许多抗议与不满。根据我研究单位的研究指出，从2012年的春天开始，也就是从乌坎事件之后，几乎广州和深圳（广东县）的村庄都爆发激烈的集体抗议。村民最后赢得了2013年的反对公司领导的战役，而新选出的董事会签了新的

集体产权租约，带来了1千6百万（1亿人民币）的进帐。

和劳资争议不同的是，反对土地征收的抗争和贪腐可以为村民的个人经济带来保障，也可以挑战地方政府的统治正当性。由于传统的家庭和邻里的关系以及世代都住在同一个村，土地抗争一直是长期的抗战，并且为社会和政权的稳定带来威胁。此外，若不妥善处理抗争，日后的土地分配和都市发展会无法展开，所以地方政府无不开始严格调查和惩处贪污的按键。在广州市，几乎有4分之1的村庄干部因此被惩处。

在中国威权政府的统治下，程序规则（如村庄选举和诉讼）是一种有解决抗议事件的有效方式。在乌坎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政府面对这个强烈的抗争，采取的是进行法律调查贪污，并重新举办选举。同时，在许多村庄里面，选举非但没有办法保障村民的产权，反而成为了干部和派系中饱私

囊、贪污腐败的手段。所以村民对选举大多没啥好感，不认为选举是权利，反而看成是贪腐的巧门。田野中的受访者告诉我们，只要有人赢得选举，那结果就是权力让人腐败。

现有的农村治理系统是奠基在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上，这严重侵蚀了乡村的自主性。照理来说，政府在都市化过程中应该是满足人民需求和保障基本权利，使其转型为都市居民。现今，国家和农村的互动改变得很快，双方都在找寻新的地方治理模式。可是即使尝试再多的方法，若是现有土地产权制度没有改变，村民永远是都市化的牺牲品。■

> 疏浚抗议

长江三峡大坝

by 应星，中国政法大学，北京，中国



云阳县的运动者叙述何克昌事件。应星摄影。

当代中国社会中，一旦官民发生冲突，主要有四种方式解决：阶级行动、请愿、抗争、暴动。其中以请愿和抗争最为常见。以下我将以三峡大坝工场为例，讨论那些被这工程迫

迁的人民阶级行动的法律诉讼：“何克昌案”。

总共 846,200 人被迫迁移到长江保留地区，其中的 361,500 人是从乡村来的。自 1997 年来从重庆云阳县来的农民已经发动过上访请愿了，而其中的

>>

代表何克昌总共历经过了4个阶段。

1997年10月到2000年3月是从万人上访转变到集体请愿。在1997年7月，云阳县长开始了迁移居民的试验，而当地方政府公布补偿的低标准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弹。当地农民开始写信给中央政府表达其意见。

上访总共由10000人联署，这数字让重庆的党政高层和中央政府专门指派了一个工作小组去解决问题。可是政府不认为有任何的补偿不足，有的只是居民的误解以及越级上报问题的不当行为。何克昌和其他代表很不满意这个结论，从1998到2000年，他们写了那么多信到北京，亲自去了2次，到重庆也很多次，结果居然换不到任何答案。

上访和地方抗议冲的升高：2000年3月到2001年3月。在1999年5月，国家委员会决定要改变三峡大坝的迁居政策，农民

不能在附近被安置，而必须远走他乡。这引起了另外一波云阳县的抗议浪潮。何克昌是领导者，整个抗议采用了几个策略：和地方政府面对面冲突和争论，改善组织，彼此熟识和传播信息，增加请愿的强度，和国外媒体接触。

囚禁入监的折磨：2001年3月到2004年3月。在2001年3月，何克昌和其他两个代表再次到北京上访。重庆政府在北京逮捕了这三人。后来，云阳的人民法庭宣告迫迁调查组织挑战政府的政策，并把何克昌处以3年徒刑，其他2人则是2年徒刑。罪名是破坏社会和谐。这是第一次三峡大坝的请愿者被送进大牢，也引来了国际媒体的关注。

永无止尽的抗争：2004年3月至今：2004年3月11日，何克昌被释放，虽然他遭到刑求

，双腿被打断，手也被打到变形了，甚至财产全

部在2002年8月充公，其精神仍未凋谢。释放之后，他拒绝和地方政府合作，并持续收集相关信息。他已经献身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役之中。

我们在何克昌案中看到的是一种抗议策略的务实主义，从法律和非法律的方式中着手，甚至是结合两者。从迫迁居民角度而言，法治和人治的差别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策略的务实性，可不可以达成目的是首要考虑。居民诉诸法律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司法，发动上访也不是因为相信那些官员。他们采用这两种策略作为加速达到目标的方式，这其实和政府也采用这两种作为有效率的统治方式，背后的考虑点是一样的。■

> Jan Szczepanski

搭起桥梁

by Adam Müller, Kamil Lipinski, Mikołaj Mierzejewski, Krzysztof Guban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the Public Sociology Lab, University of Warsaw, 波兰

Jan Szczepanski (1913–2004) 是波兰社会学家，也是ISA的会长(1966–1970)。他也是第一个东欧担任此职位的人，其著作颇丰，专栏论述也很受欢迎，被广泛讨论。他更投入政治，是议会成员(1957–61, 1972–85)，也是国家委员会的成员(1977–82)。作为ISA会长，其面临了两大挑战，第一是东方和西方，以及和全球南方的对话。结果有一届世界大会在保加利亚的Varna举行；第二，根据其日记，他对于繁复的文书行政流程做出简化组织制度的改革。



| Jan Szczepański参加宴会。

波兰的政治体制很特殊，像是 Vincent Narojek 所说的，就是国家有限的正当性。一方面，这个政府在民意上有很高的基础，特别是在初期苏联时代。

另一方面，政府也被视为必要之恶，所以可以和苏联保持一定距离。其中一个就是其愿意绕过苏联的中央教条去建立自己的制度。「人民民主」在许多危机时候 (1956, 1970,

>>

1980) 就显现出各式各样的面貌。

波兰的知识阶级对于这个有很不同的态度：从完全反对到完全支持都有。许多人采取了困难且道德上不安的位置，这也是我们看到 Jan Szczepanski 的身影的地方，加入了形成共产党内新派别的组织，同时也反对共产党的扭曲统治。因此，在极权和知识分子之间建造起了一个桥梁，让知识分子有空间可以发声，保持相对自主性。我们也看到知识阶级在后来的团结工连运动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共产国家中，大学有社会系是相当少见的。波兰也因为如此造就出了许多杰出有名的社会学家，像是 Jan Szczepanski、Maria Ossowska、**Stanisław Ossowski**、Zygmunt Bauman、Maria Hirsztowicz 和 Stefan Nowak。

Jan Szczepanski 担任政府要职，给予教育和社会政策建议，这让他可以有机会实践公共社会学。

他不把自己当作出世的学者，而是入世的参与各种社会的讨论与改革。也因为他的政治影响力，波兰许多科学家可以出国开会。他也努力保留政府文件，让学者可以做研究。他也参加抗争，这在共产时代是很少见且需要大勇气的。例如，1954 年他加入了 34 位知识分子的联署抗议言论审查，不过在第一波的逮捕之后退出了。

他也是一位记者和专栏作家，其政治职位给予了某种程度批判政府的可能性。其公共的论述也影响了波兰一整世代的人。在那个言论自由仍然不被允许的年代，他把社会学的概念带入了公共领域。但是在他过世后的 10 年的今天，他已经被人们淡忘。尽管文章很多，可是没有留下任何理论和学术传统。他的百岁冥诞，波兰社会学会和研究院举办了研讨会，但是年轻学生没有太大共鸣。

Jan Szczepański 的一生一直为了增进人类福

祉而奋斗，也就是想达成「人性社会主义」的理想。其行动彰显了公共社会学在非民主体制下仍然有努力的空间。不过这却付出了代价：深陷权力游戏之中，并做出坏的妥协。■

> 波兰高等教育 新自由主义化

by Dariusz Jemielniak and Karolina Mikołajewska, Kozminski University,
Warsaw, 波兰



学生和教授参加New Opening of the University (NOU)的会议，这是一个 NGO，由博士生成立，研究波兰学术体制。NOU授权图片。

这不是第一次当代波兰的学术界在全球对话上发声了。在 2.4 期里面，波兰社会学实验室的成员就指出了波兰大学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问题。(1) 过去七年来，波兰的高教系统历经了重大的转变，波兰的学术界被要求要有世界级的水平。这个目标看起来很崇高，也很正当，可是事实上，改革的结果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造成更差的环境。

为了理解波兰学术

的惨况，让我描述一下这个结构性的转型带来什么样的问题。现在是个好时机，因为波兰有了新的教育部长：Lena Kolarska-Bobińska，是一位社会学教授，也是前欧洲议会的议员。她却坚持要萧规曹随。

学术的资源大概是 GDP 的 0.4%。这让波兰成为了欧洲教育经费比例最低的国家。我们也应该强调，即使波兰人可以使用欧洲的研究资金，可是只有很少数的人去申请。最

>>

近的改变意味着更多的公共资源流到了新的分配者手上，像是国家科学中心 (NCN)，而不是被送到需要的大学手中。然而，在国家的层次上，这个分配系统推动奖励和专业制度，却强化了区域资源的不平等。Mazovia 省（首都 Warsaw 的所在）拿到了不成比例多的资源。

这个不平等也是由对于博士经费的竞争所导致。20% 的总体研究计划评鉴是取决于计划执行者的成就，这也让那些研究中心的大教授得利许多。这个资源竞争在过去 20 年来成长了 15 倍的博士候选人。同时，达到学位的人数只有 2 倍成长。(2) 这是因为只有很少部份的博士生拿到奖学金，而研究和教学津贴则被取消，研究生只能落入一种被遗弃的学术阶级里面。(3)

这个过程和波兰的人口变化有和大的关系。上大学的人口从社会主义转型后的 9.8% 成长到现在的 50%，简直就是快要全世界最高了。而同时公共的资源只限制在学生人数，拨出一小部份当作研究。当波兰现在面临人口危机时，也就是少子化，大学也面临了财务问题，学校招生有困难。所以近期要把学校 Białystok 的哲学系（在波兰的东北）然后开认知科学系的事件，激起了很大的辩论。整个波兰的公共学校哲学系所都面临到了相同的处境。

其他人文科系也是。这些系都变成了次要的主修科目。

而影响到的还包括了研究质量。例如科学部引入了一种研究评量制度，把期刊的排序看成很重要，可是这些期刊排序是私人公司所排名的，也就是从 Thomson Reuters 的“期刊引用报告”里面来的。其使这个排名就算合理好了，波兰的政策也扭曲了学术的意义，也就是把那些在名单之外的期刊视为是不透明的，也漏掉了很多好期刊，粗糙地把生物和社会学等差很多的学科摆在一起比较。其他的发表也被视为是次等的，而名单内的也不加以比较，像是在牛津出版社就被放在和其他出版社同一等级。

许多的改革，包括了学术评鉴的铁笼，这些都是由政府的掌控所导致了，而不是为了教育和学术质量。例如，所有的教授都要准备详信的课程大纲，以便评量教学成效。这个官僚的举动是在监控教授的行为，不是在帮助教学质量的提升。

新自由主义的论述造成了独尊应用性研究，贬低那些无法立即带来效益的研究（像是哲学和社会学）。可是这个概念并不一致。例如，在 1989 年之后设立的私立的波兰大学没有办法得到国家补助，即使质量比公立大学

还要好。所有这些都表示出改革并没有改善高等教育，只有负面效果而已。

波兰学术界的处境岌岌可危，但我想不是特例。全世界的大学都面临了一样的状况。除非学术界和大学有一个具体和建设性的改革方案，可以改革高等教育，让政府接受，避免错误结果，否则只会每下愈况。可是事实上，我们很可能早已错失行动的良机了。■

1 Mierzejewski M., Mikołajewska K., Rozenbaum J., “One or Many Sociologies? A Polish Dialogue,” *Global Dialogue* 2:4, May 2012.

2 Michalak D., “Studia doktoranckie w Polsce – łatwo zacząć, trudniej skończyć,” March 2013: <http://noweotwarcie.wordpress.com/2013/03/11/studia-doktoranckie-w-polsce-latwo-zaczac-trudniej-skonczyc/>

3 Editorial: “The disposable academic,” *The Economist*, 2010, retrieved from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7723223>

> 关心高等教育改革的公开信

Presented to the Pol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by the Public Sociology Lab, University of Warsaw and the Critical Section,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of Cracow, 波兰

2013年9月第15届的波兰社会学大会在Szczecin举行。而经过了连续几场的学生辩论，公共社会学实验室属名了一封公开信，呼吁高等教育必须做出改革。这封信再大会中宣读，并接收到了广大的回响。而2014年1月的一场名为“当代波兰社会学”的会议中，却只有一名学生代表接受邀请参与。这里我们发表这封公开信，呼吁重视学生的问题和提出高等教育改革的方针。由Krzysztof Gubański执笔。



在Cracow举办的学生会议，讨论高等教育的堪忧前景。

亲爱的各位：
我们是一群关心学术环境议题的学生。我们虽然并不代表所有的社会学学生，但是作为一个来自 University of Warsaw 和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的学生组织，我们想要公开我们之前对于高等教育议题所作的辩论，因此，也藉这个机会显示学生并不如外界所说的那样冷漠。我们已经举办了多场的会议讨论

>>

相关议题，也吸引了许多公众的参与。这表示了学生能够替自己发声！

我们发现到了一个现象：对于高教改革的辩论长期以来忽略了学者的声音。教育部作为仲裁者，却拒绝学者的投票权，把其视为是保守的一群，反对现代化的进步改革。此外，对于政府改革的抗拒却被视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同时，那些改革的支持者却说这是为了学生的利益，为了解放学生。可是学生的利益却仍然如空中楼阁、真正的声音从来没被听见。学生被看成是冷漠的一群人，没有主体性，没有说出自己主张的能力。

对于改革的讨论着重在不可调解的两种对立逻辑上：市场 VS 学术。这种方式让学者产生了两种反抗的模式。第一，学者和科学家把支持市场逻辑的论述定位是接受教育部的改革方案，是由新公共管理和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第二，学者把保守的逻辑，也就是坚持理想社群的主张定位是精英主义和制度自主。可是自主在这里代表着什么呢？这里，自主

性是指市场和国家的力量所结构出的场域。可是这是不可行的。如此的论述是站在管理者的角度，把学者视为封建的反抗力量。

为了要取代这两种控诉和反控诉，也就是所谓的“教育错误”，我们提供了一种双向的公共沟对话，去讨论当代大学的需要和特征。我们也提出了一种教育方案，把学生考虑进去，看成是第一公众，以其把社会学知识直接转译给公众。和政府的改革逻辑相反的是，政府是一种商业顾客模式，而我们的是坚持学者有其自主性，可以决定专业社会化的方向。我们会希望老师可以使用各种社会学知识，而不是故步自封。举例而言，知识的共同生产，透过共同的斗争，诉求参与的平等，进而形塑波兰和欧洲的高等教育讨论。

我们相信大学生和研究生，也就是改革所诉求的受益者，有足够的潜力去挑战机会主义的诠释：封建大学的反动。目前为止，这样的潜力尚未成形，我们继续努力让学生

加入公共讨论。而问题之一是学生没有足够的改革信息和知识，此外，也包括了老师没有给予协助和鼓励。若把公共辩论让位给其他人，那输的一方会是老师和学生自己。当学术输了，那么影响力也没了，学生也不再认为自己有能力可以改变，那整体社会只会更加冷漠。

现在的学术环境原子化只会强化了教育部的霸权地位，所以，我们呼吁要老师、学生、研究生等全体联合起来。我们相信，波兰社会学会可以扮演社会催化剂的角色，让社会学负起责任去结合更广大的参与，这也关系到社会学的命运。这封公开信是要邀请各界来对话，也倡议合作。在此，我们要呼吁，这个社会的主人要看见我们的能动性，一起为共同的美好世界而奋斗。



> 土耳其编辑团队

我们从全球对话2.4期开始翻译。一开始在寻找团队成员的时候有点挫折，但是现在的团队相当的稳固了。我们其实分散在土耳其各个不同的城市，尽管地理上分开来，但是透过数字媒体，我们的沟通相当顺畅。以上是简单的介绍这个团队，接下来我们介绍各位成员。■



Dr. Aytül Kasapoğlu 是 Ankara University 社会系的教授，主要兴趣在灾难社会学、健康与疾病、研究方法、社会问题。



Dr. Nilay Çabuk Kaya 是 Ankara University 社会系的教授，主要兴趣是性别与社会发展。



Dr. Günnur Ertong 于2003年从 Bilkent 大学毕业，然后从 Ankara 大学于2005年拿到硕士学位，都是经济系。2011年从 Ankara 大学取得社会学士，论文题目是 Trust in the Health System and Patient-Physician Relationship。Dr. Ertong 之前在土耳其的健康部工作（2007 to 2012），现在则是在土耳其科学与科技研究委员会的社会统计研究部工作，其研究兴趣包括了健康系统的信任信任，对健康工作者的暴力，以及暴露风险下的小孩。



Dr. Zuhale Yonca Odabaşı 从 Ankara University 于2000年毕业，然后在 the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拿到硕士，并于2009年于 Ankara University 取得博士，论文是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Gender。她现在是 Ataturk 大学的副教授，兴趣在疾病与健康、灾难社会学、性别。



Gizem Güner 从 Hacettepe University 于2013年毕业，准备攻读硕士，并且对于暴力和阶级、族群有兴趣。她从2013年1月开始加入团队，现在于一间私人企业当审计员。



Zeynep Baykal İstanbul' s Bilgi University 的政治系毕业，然后在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拿到社会学硕士学位。其论文是 Construction of Armenian Identity in Turkey: The case of Yeşilköy，并且获得土耳其社会科学会的论文奖项。现在她在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攻读社会学博士，兴趣是族群、认同、文化、艺术社会学。她也对戏剧批评和戏剧有所研究，并持续在 İstanbul University 的戏剧系修课，她从2012年10月开始加入土耳其全球对